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的意识形态建设及其启示

——基于制度变迁的视阈

张洁^{1, 2}

(1.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 贵州 兴义 56240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 意识形态作用重大。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起到了思想先导、加快进程和捍卫保障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重大启示: 应提高对意识形态的制度指向性和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作用重大的思想认识; 实现意识形态建设与制度变迁的良性互动需要把握一定的“度”; 意识形态建设要遵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时间和空间协调统筹的思路。

关键词: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意识形态建设; 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16)03-0129-05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年), 围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这一伟大目标, 我们党开展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回溯和探讨这一问题, 对于当前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就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导权在夺取政权中的重要性, 认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于1949年八九月期间, 写了《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别了, 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 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5篇文章, 简称为“五评白皮书”。“五评

白皮书”揭露了美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巧妙渗透和潜在影响, 正面宣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序曲。新中国成立后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的7年里, 我们党从理论教育、思想批判和组织领导三个方面开启了意识形态建设。

(一) 改革理论教育,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众头脑

1. 学生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于1950年6月召开, 会议通过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等五项草案, 政治课的学习是当时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 重点是对高校思想教育理论课进行了改革。1950年8月团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团的宣传教育的决定》, 提出加强对团员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为切实加强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1952年9月1日和2日, 中共中央先后做了《中共中央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和《中

收稿日期: 2015-12-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0YJA710026)

作者简介: 张洁(1987—), 女, 江苏赣榆人,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共中央转发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在高等学校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报告〉》。

2.干部教育方面。为帮助广大干部进行理论学习,195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编印出版了一套“干部必读书”,印刷数量达300万册,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等,共12册。195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同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补充通知》。毛泽东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的任务。

3.民众教育方面。首先通过扫除社会封建落后痼疾,一定程度上净化社会主义建设的风气。而后,1952年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各界人士的思想改造。另外,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7年里,每年都要组织阅兵和各界群众游行的国庆庆祝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破、立、显,扫除“非马”、“反马”的错误思想,在广大民众中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 思想文化领域,相继发动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3年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提出以后,我们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先后有三次大的思想批判运动。

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并做了修改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提出了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重新研究一些历史人物的任务。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它涉及了文艺界、教育界,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时也过分夸大了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化界和党内的影响,以至

于把这种学术讨论变成了一场政治批判。

2.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运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提出以后,1954年先后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广泛批判。1954年10月16日,毛主席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负责人。文艺界、学术界掀起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高潮。同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王若水《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一文,提出批判文化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随后,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全面展开,从文艺领域扩大到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等领域,对五四运动以后较有影响力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了清理和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通知把思想战线提升到社会主义革命中一条极端重要战线的位置,计划从1955年开始后的连续8年中在600万知识分子中开展全国性的思想批判运动,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粉碎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思想。

3.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文化运动。1955年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由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逐渐转移到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批判的重点转向那种采取非阶级、离开阶级关系对待文艺问题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问题。同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强调指出,为了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党在思想工作中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脱离资产阶级的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然而,1955年6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给各地党委的指示》,并由胡风案件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肃反运动,思想问题扩大化了。

(三) 建构意识形态建设的组织领导机制和制度保障

1.组织领导问题。毛主席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刘少奇在1951年5月7

日—23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各级党委对宣传工作的强有力领导是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决定性问题”。

2.建立宣传网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宣传网制度和宣传员、报告员制度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为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宣传,从1950年初开始,中宣部先后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尝试建立宣传网的工作。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制定了党的宣传员和报告员制度,要求省、市、地方、县的地方党的委员会设立宣传员和报告员。“1952年底,全国共有宣传员379万人,报告员7.5万人。”^[3]宣传网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构筑的规模空前的群众宣传思想工作网络体系。

3.构建自我纠错机制。意识形态工作千丝万缕、错综复杂,过急、过快的工作方式和思路难免会出现偏差。“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的《学习》杂志根据中央的方针具体地进行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工作。但是,出现了一些根本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的积极作用、严重影响统一战线工作的过激言语。中央领导同志发现了《学习》杂志发表的一系列带有严重错误性质的文章,及时责成宣传部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检查检讨。中央宣传部于1952年3月29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195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宣传部《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及时纠正了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错误倾向。

二、意识形态建设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作用分析

制度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体系,意识形态是未制度化的思想体系。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意识形态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与新制度配合度高的意识形态能加快制度变迁的速度,保证制度变迁的有序性,捍卫制度变迁的成果。反之,则会抑制制度变迁的进程,甚至引起社会的倒退,导致制度变迁的失败。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建设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起到重大作用。

(一)社会主义革命伟大征程的先行者和导引器

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领导性、先行性和导向性的特质,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作用突出。“若干历史经验证明,在任何重大社会变革发生之前,思想必须先行”^[4]。“多数对制度变迁的解释最后都化归为外生变量的变化,致使变革的内在机理仍被锁在黑匣子中。对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作用的研究则能够打开这个黑匣子”^[5]。在革命阶段,意识形态的思想先导作用体现得尤为明显,“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6]。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意识形态的先导作用重大。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改造分为制度的改造和生产力的改造,其中制度的改造不仅包括所有制,还包括囊括政权机关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改造。正如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7]。

(二)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转变的加速器和合力阀

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时代性、动员性和合力性的特质。在制度变迁过程,越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与绝大多数人利益契合度越高的意识形态建设,越能为制度变迁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合力和动员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前后,意识形态异质性程度高,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荡异常复杂。而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核心是‘两破两立’:即不断打破那种以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可以成为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不断打破资本主义文明就是当代最高人类文明的幻觉,立只有社会主义文明才是当代人类文明的真正出路”^[8]。“从1949年到1956年的社会转变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建构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最大限度地寻求社会制度在广泛范围内的政治认同,使执政党的路线、方针、远景成为人民的共同期盼和价值取向”^[9]。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总体上适应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要求。

(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过程中的缓冲器和安全阀

意识形态建设还具有渐进性、过程性和长期性的特质。1949年至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可以形象地描述为这样的一个无限超越的过程:现实立足点→一级超越目标→(新)现

实立足点——(新)一级超越目标……——终极超越目标。这些一级超越目标都是意识形态的范畴,准确地说,是正在成长的意识形态,是不成熟、不完满的意识形态”^[10]。以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建设为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11]。因此,1952年9月5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指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12]毛泽东还用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比喻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13]。

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意识形态建设的当代借鉴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蕴含丰富的规律,对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工作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一) 提高对意识形态的制度指向性和对制度变迁作用重大的思想认识

当今世界依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私有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在全世界不占主流,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依旧存在,而且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14]。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摆在突出的位置,“是继‘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全局后又一重大战略性转变”^[15]。意识形态作为反映制度体系的思想体系,其落脚点和归宿是影响制度的设计、运行和走向。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影响大众观念实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最终达到其所代表集团的利益制度化、合法化的目标。以苏联解体为例。俄罗

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认为,“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同军事上的失败搭不上边,同经济上的失败也搭不上边,这些原因都是经不住推敲的。对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进行‘分子入侵’,使其遭受怀疑,然后再逐步清除苏联社会和社会体系的合法性”^[16],是苏联走向解体的真正原因。而美国正是利用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过程性问题,展开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渗透,抹黑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进而达到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权体系的目的。正如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识和思想的较量”,要通过帮助这些国家“培植民主的基础结构,即出版自由、成立工会、组织政党、开办大学的制度”,开展同苏联在“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和平竞争”^[17]。

(二) 实现意识形态建设与制度变迁的良性互动需要把握一定的“度”

制度变迁的阶段性需要程度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强弱态势表现有一定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意识形态建设呈现出全方位、超强势的特点,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意识形态(舆论、观念、思想等)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根本在于它执行了生产力的嘱托,而这一点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大致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是有效性的,主要在社会革命变动时期,并非通常如此……一旦进入社会和平发展阶段,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建设;等等。如果忽视了这些前提性条件,把意识形态始终视为引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18]因此,改革开放后,为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路线,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然而,这一时期确实催生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实践真理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提出和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再次表明发展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要求。因此,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强弱态势表现与制度变迁的阶段性需要

程度之间的关系,要求我们在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中既不能把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变为“唯一重要”,也不能把“极端重要”弱化为“一般重要”。

(三)遵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时间和空间协调统筹的思路

首先,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应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以及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确立了判断我们言论和行动的6条是非标准。这6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19]。同时,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最终解决,有赖于能够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孤立地抓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没有出路的。灵活性指的是意识形态建设要打破僵化、教条、封闭的工作方法,采取灵活、多变、有效的方式方法。毛泽东反复强调解决思想分歧和思想矛盾问题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和行政命令的方式,这种做法无效且有害。他指出,凡属于文化教育的问题、思想性质的问题、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20]。其次,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是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等。意识形态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一般说来,人对事物由认知转化为行动要经过知、情、意、志、行几个环节。意识形态内容的科学性并不必然代表为群众所认知、接受并付诸实践,甚至有时被扭曲、误解、抵制。群众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态度,既与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的科学性有关,同时也离不开宣传和维护意识形态建设的传播媒介、手段方法。最后,意识形态工作要把握其过程性、时间节点,同时兼具开放性和包容性,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这是因为,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1]。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22]。同时,在信息网络化时代的今天,意识形态建设突破了空间的局限和限制,要求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根据社会环境和外在条件的变化保持灵活的适应性和包容性。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完善和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的,受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与历史条件所制约,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949—

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时期,意识形态建设呈现出强大的力量。当前,我们应充分吸收和借鉴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既不偏废,亦不偏离,在良好的社会舆论和氛围内完善好并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5.
-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7.
- [3]王炎.新中国宣传网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经验[J].学术论坛,2004,(2):14-18.
- [4]杨生平.建国后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回顾与反思[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19-124.
- [5]姚洋.意识形态演变和制度变迁:以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为例[J].江海学刊,2008,(5):78-86.
-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94.
- [7]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2.
- [8]侯慧勤.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上的创新[J].新视野,2010,(2):4-7.
- [9]王子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建构(1949~1956)[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5):11-15.
- [10]张光辉.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演变规律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J].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2009,(2):15-21.
- [11][13][19][20][21][2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2;281;234;209;230;225.
- [12]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41.
- [1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684.
- [15][18]侯慧勤.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二次战略性飞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7):5-11.
- [16]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
- [17]李振城.无硝烟的战争——“和平演变”与对策[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1991:21.

责任编辑:黎伟盛